

陶氏涉园藏书、刻书纪略

郑伟章

清末民初之际，我国出现了一批藏书家、刻书家。陶湘就是其中较有名的一个。陶湘，字兰泉，号涉园，江苏省武进县（今常州市）人。生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七月，卒于1939年12月，享年七十。其本生父陶恩泽（字晋甫）官浙江淳安、德清等县知县，陶湘幼随父读书任所。稍长则考览六经，探综群籍，剖谬判疑，斐然有纂述之志。年二十补大兴县籍博士弟子员，有声于庠序之间。二十三岁由鸿胪寺序班，改官同知，任浙江某府知府，荐升道员。曾在京汉铁路任职，后又被委为上海三新纱厂总办。入民国，先后在招商轮船局、汉冶萍煤铁矿、山东中兴煤矿公司、天津裕元纱厂等处任职，后进入银行界。民国二十一年谢职居家，次年受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，任该馆编辑之事，编撰书目达五、六寒暑始卒業。

关于陶湘的藏书，其子陶祖椿等在《行述》中说：“既博洽群籍，尤邃于刘氏父子目录之学。生平于缥緗外无他嗜。自光、宣交，广事搜罗。初喜明人集部，及胜代野史之属，嗣乃旁及钞校，上溢宋元，遇孤槧善本，恒不计其值。历时既多，充溢櫛架。傅沅叔先生谓昔人评竹垞、渔洋之诗，以为朱贪多，王爱好。府君收书之癖，殆兼斯二者，可为实录。暇辄览阅、校勘，丹铅殆遍，遇疑义错谬，必冥心剖析。或与江阴缪艺风、江安傅沅叔、上虞罗叔言、长洲章式之诸先生互出所藏，商讨雠校，邮书往复无虚日。”（载于《武进陶涉园七十年纪略》）傅增湘也说他“数十年来，节衣缩食，往还于苕舟燕市之间，辛勤掇拾，以偿兹宏愿，蔚为巨观。”陶湘嗜书，非徒附庸风雅，乃为

真知爱好者。他的藏书不仅数量多（三十万卷），而且颇具特点。

其一，陶湘聚书，一改钱曾、黄丕烈、吴騫、张金吾等人专嗜宋元本的习气，而是从学术发展的实际出发，非常重视收藏明板书。仅据他自撰的《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板书目》著录，他收藏的明本书就达四万余卷。其中嘉靖本超过两百种，傅增湘为其藏书室赠以“百嘉斋”的匾额，并为撰书目序，详列数十种难得之书的书名。如陶氏所藏明版书中，精品有明朝复宋、复元精印本；有明洪武、成化、正德等年代刻本甚多；有明代著名藏书家、刻书家震泽王氏、闻人铨、汪文盛、黄姬水、范钦、吴勉学、项笃寿、袁褰、黄省曾、徐文煊、冯梦祯、赵用贤、商濬、何良俊等各家所刻精本；有明刻小字本、狭行细字本、活字本；有明人旧钞本、兰格钞本、著名学者手跋手校本等。其中如张佳胤刻本《华阳国志》，为顾千里觅而终未得觐见之书；《南雍志》虽为嘉靖本，但完整无缺，甚为少见；碧云馆活字本《鹖冠子》为海内孤本；继雅堂刻《昌黎先生集》极精湛；正统袁旭刻《宛陵集》为初印本，极精美；玉几山人刻陶渊明、王右丞、李太白、杜工部等人文集，最为少见；明初湛甘泉刻《元次山集》亦罕见。其他明代佳槧、完整无缺之大部类书《艺文类聚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锦绣万花谷》、《事文类聚》、《山堂考索》、《古今合璧事类》等，也都是难得之书。明代刻书甚众，确有一些是粗制滥造、刻印不精的书，但陶氏所收，大多均经他精选所得。

其二，搜罗毛晋汲古阁刻书甚全。毛晋家有汲古阁藏书，尤喜影钞宋版书和刻书，是明代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藏书家、刻书家。所刻书有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古今百家》、《津逮秘书》、《词苑英华》、《列朝诗集》、《宋名家词》、《六十一家词》等约六百余种，这些书除少数翻刻质量不高，校雠不精

外，大多为世所重，如上列各书，部帙浩大，又为有用之书。毛晋刻书，当时并未留下书目，道光年间郑德懋撰《汲古阁刻板存亡考》及《汲古阁校刻书目》等，顾湘刊入《小石山房丛书》，这才引起人们对毛氏汲古阁刻书的重视。至清末民初，陶湘极力网罗达五百四十余种，仅缺百分之四、五，几复旧观，并编辑、刊刻《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》。

其三，搜罗吴兴闵板套印本尤备。据考证，我国在元末即有两色套印的书籍。明代，两色、三色、四色、五色套印已经盛行开来。这是我国印刷事业史上的又一件大事。到明末，吴兴的闵齐伋、凌濛初两家所刻套印书很多。这些书用不同颜色，或分别标明正文、注释，或区别不同校者，斑斓彩色，娱目怡情。闵、凌两家出版套印书籍有多少，无书目留世，人们不得而知。从社会上流传的这类书估计，大约有一百三、四十种。到了清末，藏书家对闵板书不甚重视收藏。陶湘独具慧眼，竭三十年之力，留心搜罗闵板书。到1931年为止，他荟集之书达一百三十七部之多，几乎网罗齐备。其中有五色套印《文心雕龙》、四色套印《南华经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等，又有《西厢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邯郸记》，皆为传世不多的妙品。其他如《程氏墨苑》，系五色初印本，为近现代藏书家所重。

其四，注意搜罗清代武英殿刻本书，尤其注重殿本书中之开花纸印本。清朝康、乾年间，皇家于武英殿设修书处、刊书处，遴选词臣，编纂校讎书籍，并精刊精印之。殿本书除储藏宫殿和颁赐臣工之外，世间很少流传。到同、光年间，武英殿、仪銮殿、中正殿等处多次发生火灾，官中所储殿本书，才逐渐散出。陶湘垂四十年之力，专心搜集殿本书，得五百数十种。这类书中有一类开花纸本，纸张洁白如玉，色泽光滑，坚韧细密，使人见之赏心悦目。如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御纂七经》、《仿宋岳氏相台本五经》、《钦定二十四史》等，无不是部帙巨大、纸墨精良的珍

品。因陶湘专嗜此类书，人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，称之为“陶开花”。

其五，搜书务求其精，且讲究书籍之装帧。关于这一点，傅增湘叙述较详：“其收书之法，一书辄兼数本，一本之中，又选其纸幅之宽展，摹印之清朗，以及序目题跋必选其完善无缺，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，往往一书而再易、三易，以靳惬意而后快。入库之前，复躬自检理，重付装潢，被以磁青之笺，装以靛布之函，包角用宣州之绫，钉册用双丝之线，务为整齐华焕，新若未触。有时，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，而毫不知吝。故持书入市，一望而识为陶装。”（《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板书目序》）

陶湘的藏书处名涉园，涉园中又有百川书屋、百嘉室等，百川书屋以其收藏宋板《百川学海》而得名。其藏书数，据前引傅增湘语为三十万卷，仅明版就有四万余卷。其藏书印记有：“阳湖陶氏涉园所存书籍之记”、“兰泉”二字小白文方印、“百川书屋”朱文方印、“涉园珍秘”朱文方印、“阳湖陶氏涉园藏书”朱文长方印等。

陶湘的藏书目录有：《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板书目》一册，傅增湘作序，为陶氏所藏明版书之专目；《涉园殿版目录》一册，又题作《涉园藏书目·殿板部》，有陶湘之弟陶忆园所写序，为陶氏所藏殿本书之专目；《闵版书目》，有傅增湘序、陶湘自序，为陶氏所藏闵版套印书之专目；《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》，为陶氏聚集毛刻书之专目。惜未见陶氏藏书总目。除以上数种专目之外，似应还有所藏宋、元本、钞校本、稿本及清刻本之书目。

陶湘精流略目录之学，是近代较著名的目录学家。1925年，傅增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，因陶湘既雅善鉴藏，又精通目录学，特聘请他任编辑。陶湘花了六、七年的工夫，整理、编撰了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》三卷，他不辞劳苦，考订精严，使有清一朝九帝之制作，长期扃闭于文楼秘阁之书籍，“一旦挈领

提纲，呈露于人人之耳目”（《行述》）。陶湘又辑刻《武进陶氏书目丛刊》十五种，有：《闵板书目》、《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》、《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》、《清末殿板书始末记》、《清代殿板书目》、《武英殿聚珍板书目》。《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》、《钦定石经目录》、《昭仁殿天禄琳琅前编目录》、《昭仁殿天禄琳琅续编目录》、《五经萃室藏宋板五经目录》、《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》、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》、《内府写本书目》，附《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印工价等定例》。这些书目、史料均关系明、清以来目录学、版本学，为实用难得之书。陶湘又刻印《涉园所见宋版书影》两册，为研究宋版书留下了珍贵资料。

藏书家刻书，这是明毛晋、黄虞稷、周在浚以来的一个优良文化传统。黄、周二曾撰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》，列四部秘书九十六种，响应者甚众，一时，流传古籍成为风气。至清代，藏书家刻书尤盛，鲍廷博知不足斋、钱熙祚守山阁、张海鹏借月山房、黄丕烈士礼居等，所刻书既多，又校讎纸墨均精良。至晚清民初之际，此风益盛。刘承幹、张元济、罗振玉、缪荃孙、刘聚卿、伍崇曜、董康及陶湘等人，所刻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，都有超越前人之处。陶湘与他的同辈相比，在刻书方面，所花精力尤多，所刻之书尤精。伦明先生在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中说，陶湘“尝谓友人，欲尽罄所有，从事刻书，期之十年，可成万卷，流布他日，藉以不朽云。”可见，他是把刻书流布古籍作为自己的事业，不遗余力，终生为之奋斗的。正如他的儿子陶祖椿等人所说：“其刊书也，尤为一生精力之所粹。自钐板以至校讎，无不躬执其役，风雨晦明，未尝或辍。尝诏不孝等曰：‘非敬无以举事之体，非恒无以集事之成。吾生平于刻书，略有成就者，赖此二字之力耳。’”（《行述》）

涉园所刻之书，其精者大者主要有以下十余种，

《儒学警悟》七种四十卷，一函十册，宋俞鼎孙、俞涇同编。前人以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为丛书之祖，实际此书比《百川学海》早七十余年，为丛书真正的鼻祖。是书底本为明钞明装，经盛昱郁华阁、缪荃孙艺风堂收藏，并经缪氏精校。其中汪应辰著《石林燕语辨》十卷，为宋代陈振孙所未见，明代《永乐大典》所未录之书。涉园精刻于1924年。

《百川学海》十集一百种，一百七十八卷，三十三册，宋左圭辑。是书为继《儒学警悟》之后的较早编纂的丛书。所据底本为南宋咸淳本，经明代文征明之玉兰草堂、清徐乾学之传是楼、季振宜之静思堂等著名藏书家递藏，涉园影刻于1928年。

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四十种。是书为荟集宋、金、元、明各代词人专集之丛书。历史上除毛晋汲古阁、鲍廷博知不足斋等家刊刻过名家词专集外，有影响的不算很多，传世者寥寥可数。是书创自吴昌绶双照楼，吴氏刻至十七种，因绌于资，乃将版本售归于陶湘。陶湘复踵其义例，选工精刻至四十种。其书“专搜宋元旧本，景写刻之，使后来获见原书面目，所辑皆善本、足本，藉证曩时一切钞校之陋”。（陶湘《后记》）

《景汲古阁钞宋金元词》七种。是书为陶湘所得毛氏汲古阁藏七种宋金元词钞本，据以影印出版。

《喜咏轩丛书》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编，五函四十二册。1928年开雕，1932年刊竣。是书选刻均为罕见之本。如《天工开物》，据日本东京前田氏尊经阁藏宋应星原刻本校勘，又补入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授时通考》所载之各图刻成。四库全书馆《补肖氏离骚图》上中下三册，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，为诗、图合璧之书，令读屈子《离骚》者易于理解，文字、图绘、刻工均较精致。

《百川书屋丛书》七种，一函六册，1930年刊刻。中有毛钞本《郑世子瑟谱》、《瓶笙馆修箫谱》等。

《百川书屋丛书续编》五种，一函三册，1931年秋印行。是书为武术、印谱、名人墨迹之书，亦多为难得之书。

《託跋廬丛刻》十种，一函八册，1924年开雕，1929年梓成。是书所集皆宋元明人罕见之著作，所据底本亦皆宋、元板或旧钞本，刻印为仿宋元本。其中《髹饰录》二卷，底本来自日本，为我国古代油漆、绘画、装饰之书，极少见。

《涉园墨萃》十二种，三函十四册，1929年刊成。是书荟萃宋以来各家有关于墨的各种书籍，有宋李孝美《墨谱法式》、宋晁贯之《墨经》、元陆友《墨史》、明沈继孙《墨法辑要》、明方瑞生《墨海》等，使墨书成一统系，甚为可贵。

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六卷，一函七册，宋李诫撰。是书依影钞宋绍兴本，按崇宁本格式校刻，朱墨套印。此书为我国古代土木建筑之奇书。陶氏影刻此书，书幅宽大，纸墨精良，字画爽目。而且校讎着力最深。是书在丁丙善本书室所藏钞本的基础上，以文溯阁、文溯阁、文津阁三本互勘，又借晁氏摘刊本、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对校，缺者补之，误者正之。

陶氏刻书其他尚有：宋巾箱本《八经》八种，为玻璃板影印；元《程巨夫全集》三十卷，据明洪武本；元《顾氏草堂雅集》，据上海徐氏旧钞本；明钱叔宝手钞《游志续编》一卷；《昆陵周氏家集》五种三十七卷；《昭代名人尺牋续集》，石印影印本以及各种书目等甚众。

陶氏刻书有两个显著特点，一是所刻大多为流传较少之书，或罕秘孤本，如《儒学警悟》、《百川学海》、《宋金元明本词》、

《天工开物》、《营造法式》、《离骚图》等。二是所刻各书均较精美。或影刻宋元本、影抄本、旧抄本，或五色套印，朱墨套印，或精写精印，陶氏无不是不惜工本，务求其精。今人至册府索其印书，一开函，无一不是纸幅阔大，纸白如润玉，墨色如点漆，字画悦目，装订整齐，使人精神为之一爽。

陶湘晚年奇窘，为生活所迫，“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。急景凋年，不祭书而去书，其心境之恶，亦可知矣。”（郑振铎《劫中得书续记·佳日楼集跋》）对于涉园藏书之散佚，伦明、郑振铎、雷梦水、袁行云、李新乾诸先生均有记述。大体情况如下：所藏殿板、开花纸印书一百数十种，以四万元归于北京文友堂书肆，其中《平定各省方略》等二十余种经易培基介绍，售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，有十余种经松筠阁介绍售归日本东洋文库，其余均为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孙子高先生买去，孙氏书于1961年散出，为北京来薰阁书肆所得。又有殿板、开花纸印书一百余种，由魏丽生以三万元售于废帝溥仪，今不知踪迹。所藏各种丛书共五百七十四种，二万七千册，其中包括宋刊本《百川学海》、明抄本《儒学警悟》等极珍贵之书，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囊括而去。有一部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足本，五百册，误以为丛书，亦一起售归该所，此书其他藏书家所藏均为残本。汲古阁本、闵本套印书则售归满族荣厚，荣厚又以万元转售给废帝溥仪。闵本朱墨套印汪氏《墨藪》、程氏《墨苑》为郑振铎先生所得，方氏《墨谱》、方瑞生《墨海》等为张寿鏞约园所得。其余尚有八十余种明板书在台湾。据苏精先生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云：“最后一批押在盐业银行的八十余种明版书，则在身后为中央图书馆收得，这批以明人文集为多的古籍，是所知台湾地区唯一较大宗曾经涉园旧藏的善本。”

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北京《求是》杂志编辑部